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三輯

中韓文化論集(三)

董作賓等著

大韓民國憲法大綱解八卷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三輯

中韓文化論集(二)

董作賓等著

董仲舒集

中韓文外論集(二)

海外圖書基本叢書 第三種

上 韓文外論集

中韓文化論集(三)

目次

中韓書緣·····	蔣復璁·····	壹
中韓金石文字因緣·····	蘇瑩輝·····	壹
中韓使節詩話·····	彭國棟·····	三
地理觀點上關係密切的中韓·····	王益厓·····	壹
中韓的交通·····	宋希尚·····	六
中韓關係論略·····	勞 幹·····	三
中韓一家·····	李通揚·····	壹
中韓對世界的共同責任·····	臧啟芳·····	四
中韓兩國需要長期合作·····	李士英·····	三

中韓關係大事年表

楊子六

四三

附錄

中國關於韓國著述目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	一—三
中國刊行韓國著述目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	一—八
臺灣公藏高麗本聯合目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	一—三

中韓書緣

蔣緯德

我中華文化，傳播域外，以韓國爲最早，史記微子世家載：「箕子封於朝鮮」。可爲明證。

韓國增補文獻備考卷二四二藝文考云：

「高麗子曰：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其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皆往從焉。」

韓國文化，自由箕子啓之，今日平壤乙密臺之西殿有箕子陵，千秋俎豆，中韓兄弟之誼，此其基焉。自漢武建四郡以迄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鼎立之初期，皆受漢魏晉文化之影響，且韓向日本輸出，在骨中日之間，韓每爲之介也。三國後期爲吾國之南北朝時期，三國於南北朝皆教朝貢，時佛教興盛，故佛經佛像，競相東傳，於是而入華求法，高僧赴韓，相望於道，新羅眞興王改皇宮爲金龍寺，剃髮僧衣，法號法雲，王妃亦隨之爲尼，蓋時正梁武帝捨身同泰，弘法之時也。高句麗廣開土王於平壤建九寺，百濟法王王建興寺，度僧三十人；其後高麗太祖王建師事僧思滿，事無大小，皆向諮詢；凡此皆高麗仿宋刻大藏經而促進印刷之速因也。新羅統一三國後，專意唐文化之輸入，高麗繼之，典章制度，儼然可觀。趙宋代興，文極備盛，高麗學步，稱藩中朝，而未敢不稱，高麗力固於宋，於是健事遼宋，一而爲佛教文化藝術之宣揚，一面則爲儒家性理之注重，此又受宋之影響也。李朝時代則在制度方面非專事中國之仿效，如高麗之拘泥及變易之無常，而學問藝術方面更有獨特之進步，此又受明清之影響而便然也。

韓國古代藏書，據北史高麗傳云：「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則傳入高麗，先於經典者，固吾僑家之典籍，君子之師，良有以也。考中藏圖書之因緣，實相互裨益，相互授受，而韓國真書出於藏，有獨到傳秘之處，茲略分述如下：

一、中韓圖書之相互裨益

韓國圖書最初自皆得諸中國，然歷年稍久，中土失傳，又求自韓國，亦復不少，故再分述之：

甲、中國傳入韓國之圖書

(一) 三國時代 據文獻備考載稱：新羅眞興王二十六年（五六五，陳天嘉六年）陳遺劉思與僧明觀請舊經，遂釋氏經論一千七百卷。『三十七年（五七六）遣僧安弘入周求法，弘與胡僧毗摩羅來獻經如佛經』。『眞德王二年（六四八，唐貞觀二十二年）金春秋朝唐，帝賜新撰書一部』。『神文王六年（六八六，開皇十六年）遣使入朝，奏請經典及詞章，武后令有司寫古四部經，并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戒者勒成五十卷賜之』。『景德王二年（七四三，唐天寶二年）唐遣通譯來聘，賜師法孝經一部』。『景文王八年（八六八，唐咸通九年）遣李同等三人隨通譯使金胤知唐入學，仍給貢書銀三百兩，使解書』。高句麗則『小獸林王二年（三七二，晉咸安二年）樂王苻堅遣使送佛經』。『寶藏王二年（六四三，唐貞

觀十七年）遣使如唐文道教。太宗遣道士叔達等八人，兼賜道德經』。『百濟則『毗有王二十四年（四五〇，宋元嘉二十七年）遣使朝宋，求易林武占。文帝詔與之』。『聖王十九年（五四一，梁大同七年）遣使于南，請經等經義毛詩博士。梁主給之』。

(二) 高麗時代成宗十年（九九一，宋淳化二年）『高麗遣兵官侍郎韓泰奉朝宋，求印佛經。詔以大藏經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并御製藏經遺教錄蓮花心論賜之』。『十一年（九九二）遣使于宋，上書願賜板本九經，用教僧教，詔給之』。『顯宗七年（一〇一六，宋大中祥符九年）民部侍郎郭元朝來，帝賜九經、史記、刑漢書、三國志、晉書、詩子、曆日、聖惠方等書。』。『十三年遣禮賓卿楊元信等入京，求佛經。詔給之』。『十二年遣韓許入京，表乞陰陽地理書，聖惠方。帝賜聖惠方、陰陽二宅書、乾闥闥、釋經一藏。』。『宣宗二年（一〇八五，宋元豐八年）宋哲宗立，遣兩使奉獻賀賀。請市刑法之書，太平御覽、開寶通鑑、文苑英華。惟賜文苑英華一書。』。『王於興王寺懺教藏經監，贈書於宋宋日本，至四千卷，悉令刊行。』。『八年遣黃宗鑑朝宋，請市書。禮部尙書蘇軾抗請勿許，然宰相府府元龜以歸。』。『肅宗四年（一〇九九，宋元符二年）宋子語刻云：『昭陽高麗王介甫新經三十本。』。『六年王繼吳延龍等朝宋，帝賜太平御覽新經一千卷，又賜新醫書教方。』。『忠肅王元年（一一三四，元延祐元年）遣博士郭初，聘徐食遠等聘書于江南，給款，宿等亦登岸。判興校洪濤以太子府參乘在東，以寶鈔一百五十錠遺衍，使購經經一萬八百卷而還。』。『論又奏：『元賜王書經四千三百七十一冊，皆宋館閣所藏也。』。『恭

懿三十九年（一三七〇，明洪武三年）帝賜大統曆，附原成准傳之。又賜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以上爲韓國三國時代及高麗時代由吾國六朝迄明初所賜與所購圖書之記載，雖簡而不詳，亦可得其梗概。明清兩朝所賜，書皆凡近，略據文獻備考，彙錄數則：

（李朝）太宗十七年遣使臣申智于明，以本國自來書籍甚少，乞頒諸三帝書註資治通鑑，趙完繼諫奏，金履祥通鑑前編，陳樞通鑑讀編，說說宋史，以資辨究。帝以書板損缺，待刊補遺賜，先以資註資治通鑑一部付發。」「順宗二年（一四五四，明景泰五年）使臣黃致身回自明，明帝賜宋史一部。世宗每令赴京講學之，未得，至是書于文昭殿，受百官贊。」「宋史刊於元末，印成不久，即遭兵亂而散，故近世所傳皆爲明成化十六年宋英刊本，朝鮮朝鮮世宗得宋史而愛寶，亦可見韓國之石文也。

韓國圖書，專就經史文集，其他雜書，皆在禁止之列。

同書同卷藝文考云：

純相八年（公元一八〇八，當清仁宗十三年）吏曹判書南公權啓：「神宮樂說一切嚴禁，並與經史而姑令勿爲購索事。昔日之聖教，出於一時矯俗之意，而正經正史久不出來，間或潛出，又犯違令，請自今正經正史及先聖諸儒文集等書許其出來，雜書詩樂小說之害吾道盡人心者，一依先朝法令而禁之，著式遵行。從之。

韓國官民之得中國書籍及新羅圖書，或翻刻原本，皆悉依國君。

同書同卷藝文考云：

新羅孝昭王元年（公元六九二，當唐武后長壽元年）高僧道證自唐回，上天文圖。

聖德王二年（公元七〇三，當唐武后長安三年）阿達金思羅朝唐回，獻景勝王經。

孝成王二年（公元七三八，當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唐使郭元振來獻道經。

神武王十三年（公元八五一，當唐宣宗大中五年）阿達元私朝唐回，獻佛經。

高麗顯宗十八年（公元一〇二七，當宋仁宗天聖五年）江南人李文通來獻書五百九十七卷。

宣宗二年（公元一〇八五，當宋神宗元豐八年）王希羅贈還自來，獻經典及經書一千卷。

成宗二十五年（公元一四九四，當明孝宗弘治七年）同中樞安讓回自京師，贈丘濬所著大業初義

補，印頒。

仁祖九年（公元一六三一，當明思宗崇禎四年）鄭斗諤回自京師獻西洋人陸若漢所贈治曆檢起一冊，天文略一冊，利瑪竇天文書一冊，遠鏡書一冊，千里鏡一冊，磁方外紀一冊，西洋圖風俗記一冊，西洋國寶獻神威大鎮疏一冊，天文圖南北極兩幅，天文廣獻兩幅，萬里全圖五幅，紅夷砲圖本一冊。

以上爲韓國官民及古代中期官吏向韓廷進獻贈送之書，因韓國歷代徵求圖書，不遺餘力，如李朝中宗十年（一五一五，明正德十年）下教曰：

書籍者，治道所寓，漢之天祿石渠，唐之秘書四庫，皆真集書籍，爲一代之寶藏。……我朝自祖宗肇新，聖鑑賈傳，諸史子集，無不鳩聚內府，廣布開卷。頃因國運中否，典守不謹，御府書籍，多致散落，秘書所藏，完書寡薄。昔河間王德以金帛求華書甚多，書之史冊，以爲獎談。今使價之赴中朝者，與求書籍以來，至於我國，雖地雖偏，文獻世家，亦豈無所蓄，如有遺經逸書，可以資博聞，裨治道者，當今求獻，予當厚賞。復命節使質正音訓於中朝以來！

韓國求書，且質正音訓於吾國，其鑒慕吾國文化之深，可以概見。中宗三十七年（一五四二，明嘉靖二十一年）又下敕求書，有「視德快多嘉訓實；其不願送官，情當而還其本」之語。其時有譯官李和察赴明，令贈綱目，而禁戲不敢實諸書錄，請詳明應部，以憑論列，口若懸河，因即顯本許質，足見其時求書，殊不易也。

乙、韓國傳入中國之書

圖書同卷藝文考云：

宣宗八年（公元一〇九一，當宋哲宗元祐六年）戶部尙書李資義應部侍郎魏權廷等還宋，奏曰：「嘗聞我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所求書目授之，仍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俾寫附來，凡一百二十八種。』」

百篇何書，胡與周易十卷，京房易十卷，鄭康成周易九卷，賡續註周易十四卷，虞翻註周易九卷，東觀漢記一百二十七卷，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緯詩二十二卷，樂遊毛詩二十卷，呂悅李林七卷，古玉篇，括地志五百卷，新序三卷，說苑二十卷，劉向七錄二十卷，劉歆七略七卷，王方慶周亭草本統二十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張仲景方十五卷，元白唱和詩一卷，深師方黃帝經九卷，九壇經九卷，十品方十二卷，陶隱居效驗方六卷，戶部二十卷，淮南子二十一卷，公孫龍文選水經四十卷，平船老子二卷，羅什老子二卷，鍾會老子二卷，阮孝緒七錄，孫盛齊陽秋三十二卷，孫盛魏氏春秋二十卷，千寶晉紀二十二卷，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卷，魏澹後晉書一百卷，魚豢魏略，劉勰梁典三十卷，吳均齊春秋三十卷，元行沖魏典六十卷，沈孫齊記二十卷，楊雄集五卷，班固集十四卷，崔融集十卷，汲冢紀年十四卷，謝靈運集二十卷，顏延年集四十一卷，三教珠英一千卷，孔道文苑一百卷，類文三百七十卷，文館詞林一千卷，仲長統昌黎書論，諸葛亮集二十四卷，王羲之小學篇一卷，周處風土記一卷，張揖廣雅四卷，管仲志四卷，王祥庚子集志，葛洪月令章句十二卷，信都芳張氏書九卷，古今樂錄十三卷，公羊墨守十五卷，戲乘廣疾三卷，孝經劉邵注一卷，鄭注九卷，兩雅圖贊二卷，三蒼三卷，碑善三卷，衛安官書一卷，通雅文二卷，凡將篇一卷，在書篇一卷，飛龍篇一卷，聖皇草一卷，勸學篇一卷，晉中興書八十卷，古史考二十五卷，伏侯古今注八卷，三輔黃圖一卷，漢官解詁三卷，三輔決錄七卷，益部耆舊傳十四卷，襄陽耆舊傳五卷，稽康高士傳三卷，支曇春秋，千寶搜神

記三十卷，號名臣集三十一卷，漢名臣集二十九卷，今得七卷十卷，世本四卷，申子二卷，陸氏子一卷，胡非子一卷，何承天柱石，高士康氏集志一百卷，十三州志十四卷，高麗風俗紀一卷，高麗志七卷，子思子八卷，公孫龍子一卷，慎子十卷，晁氏新書三卷，風俗通義三十卷，記勝之得三卷，龍應圖一卷，大衍曆兵奇策要七卷，司馬法漢圖一卷，胡若麟錄二卷，黃帝大藥三十卷，名醫別錄三卷，曹植集三十卷，司馬相如集二卷，祖暅新論十卷，劉琨集十五卷，盧諵集二十一卷，山公啓事三卷，書集八十卷，應璩百一詩八卷，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集材二十卷，計餘子十五卷。

據文獻備考及日本朝鮮總督府編輯朝鮮史依照高麗史與東國通鑑所載，此一百二十八種書目乃宋帝昀高麗所求者，但宋史，宋會要及懷柔通鑑長編均未見，且元祐六年亦未載有高麗使臣李資義及魏繼叔之朝貢，然以宋及高麗之關係考之，則雙方之記載，互有詳略，故高麗方面於此特爲詳明，亦當可信，而可信者尤有幾點：

- 一、宋時似多信高麗有異書佚書，如張堽錢貴昇集云：
- 二、宋時人多信高麗進有異書，如朱子語類云：

嘗見韓絳等說：高麗入貢時，神宗諭遣先索古書，及進奉，有六經不曾焚者，神宗喜，即欲頒行天下，王介甫恐壞舊經，遂奏云：「真偽未可知，萬一刊行後，爲他所欺，豈不傳笑夷夏。」神宗遂止，本亦不傳。以某觀之，未必有是事，蓋州添高麗時，介甫已不在相位，且神宗甚剛明，設使所進真有契于上心，亦豈介甫所能止也。

案陽所論甚是，惟就此可徵宋人對高麗藏書估價之高，因吾國文化極播於國外者，以韓日兩國爲最多，佚書亦惟此求之，如歐陽修之日本刀歌，疑百篇尚書存在日本，亦有疑在高麗，元人尙仍此說，如顧炎武曰：

近有得朝鮮本尚書於洪範八版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保中宣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陳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亦係偽撰也。

- 三、宋時高麗確有獻書，如文獻備考卷一七二文詞考云：

遣黃宗鑑獻黃帝餘經。

此條已見前引，亦見宋史高麗傳，作黃宗鑑，恐有一誤。

- 四、宋時高麗獻書，確有異本，可補吾國之缺佚者：

宋邵博聞見後錄卷九云：

神宗皇帝後漢書范曄姓名，欲更修之，求東觀漢記，久之不得，後高麗以其本付歸官某於上，神宗已歿代矣。至元祐年中，高麗使人曾狀，助予書者編知者，醫已死，予其意得之，藏于中秘。

宋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說苑云：

李德裕云：「館中說苑二十卷，而翻反質一卷，有蒙乃分條文爲上下，以定二十卷，後高麗遣一卷，遂見。」

玉海第五十二卷藝文書目錄云：

元祐七年五月十九日詔書省言：「高麗獻書多異本，館閣所無，即校正二本，別寫藏太清樓天章閣。」

玉海第五卷天文漢京房易傳條云：

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疑隋志周易占十二卷是也。

以上所舉高麗獻宋之黃帝經、東觀漢記及說苑三書，皆在宋延訪求書目之內，雖三書之獻，時間先後不同，未必即應元祐六年之求，蓋既貢奉，然宋代採訪遺書，歷朝皆所致力，或早已有詔向高麗求書矣。總之韓國有圖書傳入中國，固彰明較著者也。

二、中韓板刻之相互傳授

韓國在三國時代，即接授兩種文化，其後反映在圖書板刻方面，即：一受中國儒家之影響，而翻刻經史，編刊圖經；一受中國佛教之影響，而雕造大藏經。韓國在板刻技術方面因受中國泥活字及鑄活字之影

響而發明銅活字，轉而傳入中國，亦傳入日本。茲將三種刊刻相互傳授之經過，分述如下：

甲、李朝以前圖書之刊刻

韓國因中國圖書之傳入，於是而文敎大興，建立學校，進而從事刊刻。據文獻備考所載：高句麗小獸林王二年（三七二，晉咸安二年）立太學，教子弟。百濟近肖古王二十九年（三七四，晉孝康二年）以高麗爲博士。百濟自開國未有文字，而是時有書記。高句麗與百濟之立學，相差不過。新羅則至眞德女主人二年（六四八，唐貞觀二十二年）金春秋如唐，始國學，觀釋奠而還，東國始知有釋奠之禮。五年崔大舍二人，位自舍知至泰麻爲之。據莊剛大舍乃國學之官，在神文王二年六月（六八二，唐永淳元年）立國學之前已有學官而有學矣。神文王十二年攝臨龜高秋，惠博學，能以方言解九經義。又以儒語製更札，行於官府公簿。此爲高麗文之起源，始發於臨龜，至朝鮮世祖，命著口訣。及宣祖而設局，著定該解。最初原以便解釋，通口語，繼乃成爲文字，於是漢文替矣。景德王六年（七四七，唐天寶六年）置國子諸業博士助教。國學之制度乃漸興備，及李朝而推之四學海學，書院林立，頒賜圖書，較之吾國，實無遜色。

高麗「成宗九年（九一〇，宋淳化元年）置修書院于西京，令諸生抄書史而藏之。當成宗時，書館有須抄寫。文宗十年（一〇五六，宋嘉祐元年）西京留守奏：「京內進士明經等諸業學人，所業書籍，率皆傳寫，字多乖錯，請分屬修書院所藏九經、漢書唐書、論語、孝經、子、史、諸家文集、曆卜、地理、律算

諸書，假於韓學院。」王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九經乃高麗成宗十一年，即宋太宗淳化三年向宋乞賜，顯宗七年，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詔給者，文宗十年所印，可知即據宋本九經而印者，最初刊刻實書之時，雖不可知，大約不出宋之真仁。正宣宗於興王寺置藏經館，諸書於宋日本，至四千卷，悉令刊行。此乃大體圖冊刊刻大藏經，採集圖書，佛經居多，恐係專印釋典，非刊刻實書。明宗二十二年（一一九二，宋徽宗三年）命吏部尚書鄭因徵，刊諸書集覽等，雖未指諸錄，令州縣印以進，分賜侍從儒臣。此時刊刻實書，已由中央而擴及地方，乃為普遍之翻刻也。

乙、高麗藏之證據

韓國實書之刊刻，恐稍後於高麗藏之雕造，高麗刻大藏經，在韓國文化史上，實一大事實，且此事關係遼宋之爭，高麗處於二者之間，因力屈於遼，乃乞鑒於佛法，而刻大藏經。

李相國奎報集丁酉年分（高宗二十四年，一二三七，宋嘉熙元年）大諫副提君臣新告文云：

因考厥初草創，則昔顯宗二年，契丹主大舉兵來征，顯祖南行避敵，丹兵逼屯於岳陽不遠，於是乃與羣臣發無上大願，誓刻成大藏經本，然後丹兵自退。

高麗藏之初雕，動機固在政治，而考慮諸道，則韓國於三國時代接受遼陳索周所送佛經已多，而「契丹武帝於琳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目錄」，此隋書經籍志所記佛經有藏之始，亦三

韓所親受而種其因。宋史高麗傳載：「（端拱）二年（九八九，高麗成宗七年）……若長治道治（成宗名）遠僧即可表奏來觀，請大藏經，至是賜之。」此高麗所得之第一部大藏經，北宋開寶藏始工於開寶四年（九七二），畢工於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其必為開寶藏經無疑。高麗傳又載：「（淳化）二年（九八九）韓帝奏資，帝遣表遣治意，求印佛經。詔以藏經并御製藏經並送金心論賜之。」此高麗所得之第二部大藏經，恐仍為開寶藏經也。（天禧）三年……高麗遣使使禮貢佛經之僧至……求佛經一藏。詔賜經。」此高麗所得第三部大藏經也。自太平興國至祥符，迭有賜經、許符又有法寶錄，此恐非開寶藏矣。契丹又兩次送藏經與高麗，一為高宗十七年（一〇六三，遼道宗清寧九年），一為文宗二十六年（一〇七三，遼道宗咸雍八年）大約取校數本，以求完善。雖送於顯宗十一年（一〇二〇，宋天禧四年），成於文宗三十七年（一〇八三，宋元豐六年），至六十四年之久，高麗藏之刻，不可謂不慢矣。諸家所引，附有書影，取與開寶藏書影比對，字體款式，完全相同，高麗藏卷稱爲開寶藏之弟子。世人每謂道城金藏承開寶之法乳，其實開寶藏係行十四或十五字，高麗藏所見，亦行十四字，道城藏則行十四字至二十七字，十四字者長開寶藏相同，蓋道城藏中雖有開寶藏也，「增廣金人入汴京，虜經板一千七百片以去，中有經板，此今日道城藏中有開寶藏之原因也。故道城藏乃金代翻刻及雕配之藏經，與高麗藏之採開寶藏仿刻，實有不同，由此可知高麗本據宋之善及刊刻之不苟，實始基之固也。而高麗藏與中土板刻尙有一段因緣，則據宋史得四大宗史記：「四年（九七九，高麗景宗四年）春正月丁亥命太子中允張治，著作佐郎句

中正使高麗，告以北伐。「宋之弱韓，本以對遼，雖迄無成就，然句中正之去，恐與高麗刊刻藏經有關，因據碑誌考證，則唐宋在蜀已盛行雕板。據宋史毋守謙傳，則「毋昭裔在成都，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錄板。」句氏歸宋之後，又「與徐鉉重校定脫文，校印頒行」(見宋史句中正傳)蓋蜀毋昭裔與宋初之刻書，句中正皆與有關，而開寶藏刻於益州，在吳越宋內附，宋監刊書，宋監杭州以前，蜀刻最著，故開寶四年命張從信往益州雕版。句氏來自益州，諒必知之，吾友曩彼得先生疑句氏使高麗，恐與高麗刊刻大藏經，在技術上或有關係，雖無確證，余則擬以為然而加以說明也。

初雕高麗藏，凡五千九百二十四卷，原藏於符仁寺。高麗高宗十九年(一二三二，宋紹定五年)因蒙古之入侵，經板被毀。李奎報新古文謂：「板年之功，一旦成灰，國之大寶喪矣。」於是陳重雕高麗藏，欲「借印通之力，使國民咸睹，歛藏遺道。」蓋時正以謙且為患，故高宗君臣憂大弘願，重加雕造，始於高宗二十三年(一二三六，宋端平三年)，畢於三十八年(一二五一，宋淳祐十一年)凡十六年，增至六千五百五十七卷。此本甚佳，皮藏於伽耶山海印寺，現尚存在。日本藏有一部，乃朝鮮世祖惠莊王二年(一四五七，明之順元年)就海印寺藏經所重印者也。

丙、銅活字之發明

韓國銅活字之發明，與高麗藏之雕造，皆屬林重要事，而銅活字尤與書界文化有關，因德國谷騰堡

J. Gutenberg)受吾國骨牌之影響，而發明以活字印書，其試驗成功，在一四四五年，當明正統十年，韓國之用銅活字，則遠在明初。推其源流，則吾國於宋慶曆間(一〇四一——一〇四八)已有畢昇造膠泥活字板，見宋沈括夢溪筆談，其後有以鉛為活字，尤時王禪創木活字。明代亦有銅活字，如：錢大昕之竹汀日鈔及羅維之鐵字銅刻樓書日均載客齋閑筆，有明弘治八年錢山華造序，板心有「會通館活字銅板印」八字。瞿目又著錄有春秋繁華，有「正德丙子李夏錢山華鑄堂華聚尤剛活字銅板印行」一行，案昌熾藏書記事詩記華氏云：「錢刻制出膠泥上，層疊疊絲字字分，一日流傳千百本，何人不頌會通君。」明代除會通館及國子監華氏外，尚有桂坡館安氏，亦以銅活字本著。常州府志云：「安國，字民泰，錫縣人……嘗以活字銅板，印吳中水利通志。」據香林清話，安氏以銅活字向印有類魯公集，徐堅初學記等書。其以銅活字印書者，何有數家，惟以無錫華安國家為最著，華氏印客齋隨筆，係明弘治八年，(一四九五)當李朝燕山君元年，而韓國則早約八九十年。高麗史百官志云：

恭讓王四年(一一九二，明洪武二十五年)置書鑄院，掌鑄字印書鑄，有令丞。

恭讓王四年為高麗最後的一年，時值易代，當能暇鑄字印書，然韓國已有此鑄鑄矣。

增補文獻備考藝文考云：

華化伯歸道傳真書鑄師曰：夫為士者，雖有向學之心，苟不得書，亦將如之何哉？而吾東方書籍罕少，學童皆以讀畫不厭為快。余亦將此久矣，切欲真書鑄師鑄字，凡經史子書諸詩文，以至醫方兵

律，無不印出，俾有奉於學者，皆得讀焉，以免失時之歎。

按鄭道傳爲世子儲君太宗，太宗舉兵，道傳被殺，事未實現。歸半所之創立，實始於中朝太宗，太宗英明有爲，文治武功，均有可觀，朝鮮之李世民也。其類注堂經術，故於繼位之第三年（一四〇三，明永樂元年），下敕曰：

爲治必須博覽衆書，吾東方在海外，中國之書罕至，模刻昂刻，且難裁刊天下之書。予欲範範爲字，隨書印之，以廣其傳，爲無窮之利。然供費不寬歟民。

其歸字印書經過，李朝宣宗九年（一八五八，清咸豐八年）尹定統有歸字事實，記載簡明，錄之如左：

我東活字印書之法，始自太宗朝癸未，以經籍古法詩書左傳爲本，命判司平府李穡等鑄十萬字，是爲舊宋字。世祖朝庚子，命工曹參判李穡等改鑄，是爲虎子字。甲寅，以李順事實，爲善陰諸書爲字本，命集賢殿直提學金瑬等鑄二十餘萬字，是爲甲寅字。英宗朝壬辰，正宗大王在東宮御讀大朝以甲字所印心經萬病回春二書爲字本，鑄十五萬字，藏於善信，是爲壬辰字。正宗朝丁酉，命平安道觀察使徐命壽以甲寅字爲本，鑄十五萬字，備之內閣。又於壬寅，命平安道觀察使徐浩修以本朝人韓維壽爲字本，鑄八萬餘字，亦備之內閣。壬子，命做中國四庫全書聚珍板式，取字典字本，木刻大小三十二萬餘字，名之生生字。甲寅，命內閣寫字移藏於昌慶宮之舊弘文館，稱以歸字所。丙辰，整理

機軸將印行，命提學李晚秀，原任直升行延鑒，以生生字爲本，鑄大字十六萬，小字十四萬餘，命之曰生生字，分儲七櫃，藏於歸字所。後六十二年，當丁巳，歸字所失火。戊午，命檢校提學金炳箕，提學尹定統，提學金炳國，主管歸字所，大書八萬九千二百三十三字，小字三萬九千四百十六字，韓維壽三萬一千八百二十七字，與歸字所字十七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字，藏於歸字所。上之九年，戊午，仲冬上浣，尹定統校記，金炳國書。

李朝大規模鑄字印書，實稱偉業。吾國明代用銅活字印書，約晚於韓國八九十年，當時交通頻繁，或由韓國傳來，亦未可知。清康熙間曾刻刻銅活字，印有圖書集成及算學等書，至乾隆九年而廢。四庫館開，凡由永樂大典輯出之書，照工部侍郎韓人金體蘭，用木活字排印，名曰聚珍。其後民間亦有用木活字印書者，如費目稍廉，琳瑯秘室皆是。

以活字而論，則韓國自得其法於吾國，以銅活字而實，則自由韓人創之，故韓人李璋光芝華頓說云：「歸字印書，創自本朝，非中國所有也。」又朝鮮本朝類集缺云：「活板之法，始於沈括，而盛於畢昇，然其字率皆燒土而爲之，易以殘缺而不能耐久，百歲之下，既運轉皆，範刻爲字，以助永世者，其權與於吾朝乎？」銅活字之由韓國發明，允無異議。

由上述觀之，韓國歸字之刊刻，原傳自中國；高麗之雕版，亦仍自中國；而銅活字之印書，則中國傳自韓國。宋代司中正使韓，或與高麗之刊刻有關；清代金簡之主四庫全書及創製聚珍版，固韓人爲助，

兩國相互傳授，非虛語也。日本之大藏經及佛活字又仿自高麗，三國文化，血脈相通，實一環也。

三、韓國板刻之優勝

明姜希書約石齋錄談云：

朝鮮國人愛好書，凡便人之來，俱五六十人。或舊傳，或新書，或神百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尋書目，遙人通問，不惜重值購回，故彼國反有與青藏本也。余曾見明館所刻集錄集，乃中朝使臣與彼國文臣唱和之什，樣板精雅，且蘭紙精潔如玉，海邦相悅，洵足稱奇。

韓國板刻之佳，誠如姜氏所稱述，實則自宋以來，稱述者固不乏人也，如孟子盡心下云：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四書集註云：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題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按朱子語錄，所謂外國本，即高麗本，是朱子於高麗本亦覺有勝於中國所傳。茲再略舉數例，以明高麗本之善。如高麗宋本通典二百卷，日本島田翰古文舊考云：

緣板模雅，蘭紙堅緻，雖以余之不肯觀之，亦見其高麗刻本，而不復北宋刊本與麻沙刻本之可名。

，則聖然而當於好古君子之心者可知已。況風格謹嚴，結構郭廓，並兩精嚴，一刀一撇，尙有開闢純樸氣，遠勝雕磨琢鍊之巧。……然是猶或可及也，唯夫其字句之精審，異同之近於原帙，而其裝潢則又尙是悉依當時工匠，獨僅存箕子氏遺風於山河歷落之際，却有取襲勝藍之妙，余覺其神記周京，堂堂壯都，爲之失色。

今日所流傳，與此書同者，尙有孝經，姓解，說文正字，文中子中說，通典，與後出荀子，列子，傷寒論，合爲八通。據島田翰言：「雖其緣刻稍有粗祖，印刷有后先，皆精審端嚴，毫不失趙氏家法。」又知高麗宋本列子八卷，古文舊書考云：

其注本不載晉刻，與通行本不同，大抵與高氏四解本等。而其異同則殊甚，極爲精審可據。宋有景德中國子監印本，在陳氏釋文補遺之前，是書豈出於是歟！……高麗依宋初刻本而無翻磨。……是書雖不能確知其所蓋，大抵當在宋景德以前。其取刻向校上記，加之於卷末，則劉氏校上卷尾之體乃然，今本之短於卷首，則妄矣。其異同亦精而當，尤爲近古。

島田翰爲日本狩野氏購陸氏兩氏宋本後書者，考訂板本，甚爲精審，所言當自可信。高麗本之所以可貴者，約有二端：一則翻刻原刊，不擅自割改。如高麗翻之刊本是元風雅，紙墨遠真元製，實非吾國仿刻本所可企及；一則高麗保存天水初刻五部，凡所刊刻，悉據原本，如唐書政通錄范祖禹集，此書見於唐書藝文志，近代不見流傳。高麗刊本刻在活字本之前，目連正文，當年開諸傳藏國先生，目連正文，乃卷

手本改爲方冊最初之形式，古可知也。此二書皆四部叢刊所影印，可以取證。又如中央圖書館藏高麗活字仿宋山谷詩集註二十卷，目錄一卷，係朝鮮覆宋紹定蜀刻本，實較國內所傳之宋墓本及明弘治陳浦本爲佳。館藏遼山樂府三卷，乃元末明初之高麗刊本，國內久無刊板，流傳者間有抄本，僅爲一卷，乃明凌雲翰所刻圖者，此爲宋孝宗歲次振鐸之原本，刊入麗村叢書。凡此皆爲高麗本優勝之的證也。韓國藏本之善，除宋時得書之實，尤以元時爲甚，田公主下嫁，高麗內附，有以便然，開建國寺院，至今尙不乏藏文及梵文經典，蓋皆得於元代也。

綜上所述，圖書板刻之技術，雖非吾國可專其發明，版本亦非吾國所傳者爲最佳，韓國皆預其事，相互保存，相互傳授，而促進近千餘年來漢文化之發展，中韓兩國，誠天經地義，兄弟之邦，係賴此光輝燦爛，兩國傳統之文化，非共同之天職也耶！

中韓金石文字因緣

蘇雲輝

中韓兩國原爲兄弟之邦，其歷史久，其淵源深，無待煩言。茲所論述，欲就兩國間的金石因緣，以明中韓文化交流之迹。

前言

韓國的文化，一般的都把它當作代表東方文化的中國文化體系中的一個部門；最明顯的證據，便是韓國文字採用了我們的漢字。韓國的借用漢文，較日本尤早（約在西元初年時），而日本既盜假名，仍不能廢除漢字；正猶李朝世祖（西元一四四三年，當明英宗正統八年。）創造了諺文以後，并未普遍通行，故李朝歷代的書籍，幾乎全用漢文，而歷史書籍并不多見。即如現在韓國李大統領的簽名以及若干刻全韓使用的標語，也都是舊用漢字。

一個國家的文化、道德、社會風俗，與人民生活方式，往往和宗教有歷史淵源，韓國自不例外。大韓民國現有六大宗教，除天道（其實借天的教義，顯然是受中國的影響），大倣兩教爲其自創；基督、天主教傳於歐美外，儒、佛兩教，實皆來自中國。因此也就形成韓國社會上，兼有東西色彩。但在他們的地方基層裏（包括宮殿，塔寺的形制，居傢器具的陳設和樂舞的演奏等）。仍多是我國古風，這也可見其歷史淵源。

史之久，及與我國淵源之深。

佛教雖源出印度，結果傳者乃華化後之宗教，故名僧大德不但多能通儒釋，工為漢詩文，抑且擅長書法，名家輩出。不寧惟是，即凡三韓現存金石中，亦以釋教遺物居多數，由於佛法傳自我國，先是高句麗、百濟二國王延相率崇信，追傳入新羅時，約當五世紀中葉；未幾，遂即定為國教。所以文字與佛教為中國對於高麗文化貢獻之最大者。

自佛教由中國輸入後，中國之一切美術，及已受印度影響之藝術（尤其石雕藝術），亦一併傳入高麗。試觀兩韓的金石遺蹟觀之，無論在形制或內容方面，都不難得到比較親切的印證。

中韓兩國的金石學

金石之學在中國，淵源最遠。如湯之盤銘，見於禮大易；孔悝之銘，見於春秋；左昭三年，叔向述隳鼎之銘，左昭七年，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此皆西周鼎彝之見稱於經傳者。他若齊序有「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作分錫。」之語，左傳展記「分魯公官司彝器，分康叔大呂，分唐叔姑洗」、「齊人陪嘗以宗彝」、「燕人陪嘗以鼎耳」之事，可證成周時代之以鼎彝為重器。兩漢以來，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或因以改元；或以合明應，是以以鼎彝為祥瑞矣。其他散見於史乘者，類多紀述不詳，初未足以勝於學。

一般著錄我國最早的石刻，為夏禹的碑神和延陵季子墓碑，但均不足憑信。據近人考證結果，當以石

鼓（亦稱獵場文，刻於樂懸公時）為最古。至於不刻文字的石質歷珠品，則在殷代已有發現。

我國紀錄金文最早之書，當推東漢靈顗錄和陶宏景的古金刀劍錄。其集錄碑刻之作，至遲不得晚於梁元帝時（五五二）。顧其時所錄未昌，至多僅觀作金石研究的萌芽時期。所謂「家有其器，人獻其文，」使金石之氣蔚成風氣者，實昉於宋而盛於清。

金石之學，雖源屬於漢志，然至宋而發軔，情猶史著錄之金石書三十四種，今所存者僅宣和博古圖，呂氏考古圖，薛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及嘯堂集古錄等數種。當時尚無金石之稱，博古圖等書，各家著錄類例，亦莫衷一是。迨趙明誠鑒古金石錄，所收只限於器物及碑誌。清乾隆以降，漸及於碑碣瓦當。近五十年來，則出土古物之種類日益繁多，如殷墟之甲骨、河洛之明器、齊魯之封泥、燕齊之陶器，皆有專集，而金石之範圍日益滋廣。晚近我國專錄金石之書者，首推趙銘之金石書目。其後田士衡刊金石名書彙目，始收殷契書目；黃立猷之金石書目，更兼及匋文；林鈞之石廬金石書志，於殷契諸書外，兼收洗沙磨簡；容媛之金石書錄目（民國十九年初版），其分類則以器物（包括金、石、甲、骨、匋、玉、瓦、印、封泥、竹木等）為經，以體例為緯，實較前此諸目精密。自茲厥後，凡言金石書目者，均於無形中將甲骨、匋玉、竹木、封泥諸項客納於內，蓋自其廣義言，固亦未嘗不可以「金石」一詞統攝其他（性質較近者）各類。若就狹義言，則金石書目中，不特不應涉及甲、骨、竹、木，且如磚瓦、封泥、玉器等類之書，實亦不得兼收。但自有清三百年來所輯金石文字之學，乃從其廣義者居多數。

清季以還，我國學術資料之發現，可謂遠勝前古。鑒乾嘉之學，因趙宋金石餘緒而不顧；晚近名物考訂之事，得新出史料而益彰！韓國金石學之最盛期，乃在廟宗英祖以後，其時（乾隆以降）中、韓兩國之考據之學，亦均處於隆盛狀中。

韓國的金石學家（多爲當時朝鮮的考證學派人士），當乾嘉之際，雖受我國考證學的影響頗大，但溯厥原始，在李朝時期（當明神宗時）的先覺者，如宣祖王孫則齊君、昭顯君昆仲二人，實已樹之風聲；開新學之先河。自茲以後，歷光海君、肅宗、英祖、正宗、純祖諸朝，可謂代有其人，名不虛傳。

中韓兩國的金石學家

自漢書藝文志著春秋家奏事二十篇，載篆刻石名山文，其後衛莊、樂元帝俱撰碑文，見於隋書；以迄鄭道元之注水經，魏收之志地彤，附列諸碑以徵古述，實皆中土金石學之緒矣。其有專書，則創自宋之歐陽修、趙明誠、王象之諸人。

按古物之出，莫不絕實。龍馬負圖，雖傳負書；傳說堯舜，自難徵信。炎漢以來，則代有新獲。北宋以後，地不棄寶，古物競出，集古以下，浸假而形成兩宋及乾嘉以來古物學與古文字學之大業，千古未有其比。

先是宋太祖時，竊崇鑄錢三連圖，元符間李誠撰鑄錢法式，頗開考古辨物宮室之風。迨真宗時，僧臣

考訂乾州古鼎，遂啓古器研究之端。其最初著錄藏器者，若楊東仲集古錄三篇古器圖及劉原父先集古器記，是爲宋代古金書之權輿。原父言治古器之法：「職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博識求其世誼。」（見劉氏先集古器記自叙）尤爲學者準繩。其後諸家著述，如李公麟考古圖（今佚），呂大臨考古圖，呂大臨、趙九成合撰續考古圖，徽宗敕撰博古圖錄，薛向功撰代鍾鼎彝器款識法帖，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李清照合撰金石錄，洪遵輯輯，事機漢錄字源，以及鄭樵金石略，皆爲宋代名著。

若專以古金爲限，則宋著述，猶得二十種，約百三十餘卷（參見容氏宋代古金書總述評，此就存佚合計），稍零年增史所錄，則多至三十餘家，而南渡後諸家撰述，多不與焉。今就宋人諸書之存者論之，其大別有三：呂氏考古圖及宣和博古錄，既露其形，復摹其款，此爲一類。薛氏彝器款識法帖及續集古錄，但以錄文爲主，不以圖證自名，此又一類。歐、趙金石之目，才南古器之評，長帶重觀之論，悉遠廣川之跋，雖無圖證，而頗存名目，是爲第三類。

當宋南渡之際，中原古器，多入虜營。其後談玄風盛，此學遂衰。歷元、明（宋濂曾作貞石志，于寧正亦撰天下金石志，雖錄目漸廣，但事據方志，未見其碑，尤多舛誤。）兩朝，可稱者蓋寡。清乾隆以降，所學之盛，如日中天，古器之出，十倍於宋。海寧王國維氏序諸華古金圖云：「乾隆間，高宗既出天府之藏，命廷臣仿宣和圖錄撰西清古鑑、西清續鑑諸書，而私家藏器者，亦接踵而起。其自爲證錄，有成書者，則有嘉定錢氏之十六長樂堂彝器款識，吳縣曹氏懷米山房古金圖，雒城劉氏之長安鑒古圖，歸安吳